

# 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原因：主流文献的讨论\*

张 杰

**[摘 要]**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文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机理多有阐发。McKinnon 发现了中国金融改革方式选择的特殊性,借助“金融剩余”、“金融控制”等概念,他勾画了“金融支持型”经济增长的大致轮廓,世界银行和 Maddison 则分别通过强调“初始条件”和居民储蓄的重要性而佐证了上述观点。一些文献对经济改革中银行体系的制度结构与行为方式有所刻画,它们发现,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银行体系的高不良贷款、高盈利、高流动性与经济的高增长长期并存不悖。另外一些文献进一步觉察到,在国家财政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依赖金融方式实现巨额债务融资构成改革中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邹至庄与陈志武等华裔主流学者则试图深入到历史文化层面探究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金融制度机理。

**关键词：**金融制度 金融改革方式 银行体系的制度结构 国家举债的金融方式

**JEL 分类号：**G21 O16 P34

## 一、引 言

经济改革之前,主流理论针对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研究经历了一段特殊的沉寂时期,期间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研究文献。这一研究领域重新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则已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事情了。1978 年中国启动经济改革进程以来,一些欧美主流经济学家曾受邀访问并史无前例地获得了直接与中国本土学者交流其经济见解的机会。Friedman 此间曾三次踏访中国,并在多个研究机构及大学发表演讲(Friedman,1998)。不过,除了“推销”当时国人尚觉生疏的自由市场理念以及对各地美食“大块朵颐”外,就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竟然没有留下任何令人印象深刻的言论。1985 年的“巴山轮会议”<sup>①</sup>出现了更多主流经济学家的面孔,其中包括 Tobin、Kornai 等世界级学者(赵人伟,2008)。这本来是他们近距离观察和感受中国经济金融改革进程的绝佳机遇,可不无遗憾的是,会议针对中国经济金融改革所形成的有分量的研究文献相当有限。当然,各方就中国双重体制并存与渐进改革方式达成共识已属不易,Tobin 还提出了中国应当用信贷投放总额这个更为现实的指标代替货币供给量来控制总需求膨胀的观点,带有明显的“妥协”或者渐进主义色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1985)。但从总体上看,可能受改革过程尚未充分展开的局限以及主流学者的注意力并不在此故而准备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此次会议未能触及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深层结构。

尽管如此,人们为中国经济金融改革过程寻求所谓“主流解释”的热情依然高涨。无庸讳言,面对刚刚开启的经济学的外部世界,当时中国的本土学者大都难免怀有强烈的理论自卑感,这与其

\* 张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本研究得到 2007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科学发展观与新时期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政策选择”(项目批准号:07AJY015)、“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批准号:2006BAJ07B01)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与制度金融学”的支持。

① 1985 年 9 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召开“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由于此次会议是在航行于长江的“巴山”号邮轮上举行的,因此也被称为“巴山轮会议”。

说是经济学知识存量以及研究方法的差异所致,毋宁说是长期被禁锢的学术心态使然。因此,一开始,除了一些有机会贴近或者出入改革决策层的学者需要履行其建言献策的责任外,更多真正的“行家里手”大都选择了谨言慎行。可以想象,以上情形为欧美主流经济学家频繁“指点”中国经济改革方略并不时就一些重要改革政策“出谋划策”提供了不小的市场空间。就这样,越来越多的异域学者,其中不乏名家巨擘,开始频繁现身于中国的各类学术讲座与改革论坛。一时间,他们有关中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言论也充塞于各类报刊的显著位置。平心而论,仅就中国货币金融制度层面看,他们的绝大多数观点在理论上都乏善可陈,甚至不少看法还显露出对中国问题的生疏乃至“无知”。比如在1994年,当 Miller 面对中国本土学者的询问时就曾断言,“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能把广大公众,特别是乡村居民的储蓄集中起来,并将之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去的银行机构”(经济学消息报社,1995,p.19)。事实上,在经过了16个年头的金融体制改革之后,当时中国的银行体系特别是国有银行体系的储蓄集中与投资转化能力堪称“举世无双”,并成为此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

我们不应苛求于这些远隔重洋的经济学家们,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他们有关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的看法或许与其真实的学术水平和理论贡献无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功成名就,并不打算通过深究中国问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寻求新的理论发现,因此,其每一次受访和演讲便不无“逢场作戏”的意味。可是,他们分明清楚,要对中国货币金融问题“说三道四”,须先了解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演进及其结构,在这种情况下,还动辄发表这样和那样的粗糙见解,这至少表明其学术态度的草率与傲慢。当然,在中国本土的货币金融理论特别是制度金融学研究水平取得显著进步之前,这种情形注定还要延续一段不短的时间。

概言之,主流文献围绕中国货币金融制度问题的相关讨论的确远逊于我们起初的理论期待,但这决不意味着它们一无所获。伴随改革进程的深入,不少主流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开始对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变迁过程给予更多的关注,某些深层制度构造的轮廓也似乎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少数文献甚至已经窥探到了其中的若干关键环节。

## 二、金融改革方式的选择及其绩效

20世纪90年代伊始,McKinnon 令人意外地一改此前的“新古典”面目<sup>①</sup>,开始选择更为实际的视角观察经济转型中的货币金融问题。如所预料,中国的金融改革方式及其绩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在 McKinnon 看来,这个东方大国的经济改革经历是如此特殊而重要,乃至促使他对此前一部专门讨论经济市场化问题的著作进行了“重大而必要的补充”。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地位下降竟然与货币稳定长期并行不悖,这与其它经济转型国家的“不堪”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并由此形成一个让不少学者魂牵梦萦的“中国之谜”。

那么,到底是什么成就了中国的这个改革“奇观”呢? McKinnon(1993)发现了其中的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金融剩余”(financial surplus),另一个是“金融控制”(financial control)。就前者而言,改革中相对自由的“非国有部门”(包括城镇农村居民以及乡镇企业等)在成为国有银行体系主要资金提供者的同时一直没有成为主要的信贷索求者,这样,国家就可在“不征取较高通货膨胀税的情况下”,十分从容地获取一笔数目可观的“意外”资金,以“抵消其恶化的财政地位”。相比之下,后者则是前者得以实现的金融制度前提,因为只有中央政府“保持对国有银行体系的所有权和控制

<sup>①</sup> 自1973年那本以提出“金融抑制”理论而著称于世的成名作出版以来,McKinnon 一直被誉为金融自由主义理念及其政策的坚定捍卫者和推行者。在20年后的这部著作中,尽管真正改变的只是追求金融自由化的方式与次序,而不是金融自由主义的终极诉求。但是,由于其注意力从原来较多地置于“重新界定产权”和“对银行系统迅速私有化”这一“目标”转而更多地置于“确保金融控制与宏观经济稳定”这一“过程”(1993,前言),当初的新古典理念显然已经“旧貌换新颜”。

权”,同时限制另一个“平行的独立银行体系”对存贷款市场的进入,金融剩余才能迅速积累并为国家所用。

经济改革对金融剩余的倚重意味着国家开始将缓释财政窘迫的“金融任务”最终落实到内生制度层面(而不是外生货币供给层面),而我们已知,内生货币制度的核心是银行体系。尽管 McKinnon 并未就金融任务的上述转换以及中国国有银行体系在其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发表进一步的理论见解,但他对由此导致的银行体系不良贷款以及未来重新注资的“政府债务”性质却有着相当准确的认识(McKinnon, 1993)。McKinnon 可能未曾料想,以上讨论具有显著的理论提示意义,因为它将那些急于领略中国金融制度变革别样风光的人们带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入口,由此拾级而上,金融制度演进过程诸多鲜为人知的场景都将“尽收眼底”。比如,一旦内生货币制度被政府赋予特殊的金融责任,大量资金便必然集中于银行体系,各类金融工具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空间将大为压缩;作为这一过程的制度结晶和“副产品”,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与“高货币化”现象必然相伴而行(张杰, 2006)。另如,不良贷款被视作一种政府债务,就意味着由政府承担最后偿还责任,既然如此,人们也就不能用看待普通商业银行的眼光来“打量”国有银行的行为、风险与绩效。

中国经济改革的放权让利特征以及财政地位下降后果使得此间的经济增长具有浓郁的金融驱动色彩,而在这种色彩的背后,掩藏的则是强烈的金融分权倾向甚或金融地方主义冲动。透过围绕金融分权的利益博弈,我们可以大致勾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基本线索。既然如此,它也就成为观察金融改革绩效的一个必要角度。据不完全检索,World Bank(1989)可能提供了研究上述迹象的最早文献。这些文献认为,对迅速增长目标的追求“使中央政府事先就倾向于相对扩张的金融政策”,这种政策为企业和地方“争夺资金创造了一个更大的金融舞台”。特别是,“新的中国放权政治使货币当局驻地方的代表们很难抵御地方的需求”。由于企业的周转资金和农村很大范围的购买都以贷款为资金来源,而“企业经理和农民发现自己掌握着有利条件,能够以威胁减产来得到所需资金”,与此同时,“中央尚不准备忍受增长下降带来的政治代价”,长此以往,“生产的增长就变得与金融变量紧密相连”。不过,让人困惑不解的是,增长对金融的高度依赖并未导致十分严重的货币后果。

个中缘由何在?与前述 McKinnon 的分析不同,World Bank(1996)在其后续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了金融“初始条件”的重要性,认为中国改革初期的低货币化经济潜藏着极高的货币需求,基于此,改革中快速增长的收入便随即被“企业和居民对现金和银行存款看上去不能满足的需求”所稀释,不仅企业资金紧张状况得以缓解,价格压力也因此消弭于无形,可谓“鱼与熊掌”兼得。低货币化本来是经济落后的表现,但中国却借助这一“落后优势”,为改革的从容推进赢得了宝贵空间。

基于上述讨论,Maddison(2007)进一步强调了存款增长之于经济改革顺利推进的极端重要性,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之所以异常“残酷”,就是因为“它摧毁了私人存款”;而在中国,“家庭储蓄的爆炸性增长”以及经济的迅速货币化及时抵补了“国有企业的利润损失和税收的下降”,从而保证了改革过程的平稳推进。与此前的文献略有不同,Maddison 似乎在有意无意间格外留意了国有银行的作用,如除了反复强调储蓄增长与国有银行体系的关系之外,还明确指出了国有企业“低效率乃至亏损经营”与国有银行贷款被“拖欠”之间的关系。尽管他未能进一步观察到这种关系背后的渐进改革含义,因而只对上述关系做了完全负面的理解。不过,上述讨论倒是与前述 Bonin and Schaffer(1995)以及 Gao and Schaffer(1998)的相关分析遥相呼应。稍早的这些文献通过对比匈牙利和中国的银行信贷情形,意外地发现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总体改革绩效(经济增长和福利增进)之间存在的“逆相关悖论”,由此凸显出经济改革时期中国信贷制度的特殊结构,其中自然包含着国有银行体系的作用。

### 三、银行体系的制度结构与微观表现

除了上述金融制度变迁的宏观含义以及绩效之外,经济改革中银行体系(特别是国有银行体系)本身的制度结构、行为方式及其微观表现也是一些主流文献的兴趣所在。Heffernan(2005)曾对改革过程银行部门“无偿付能力”与“高流动性”长期并存独特景象做过初步刻画,并正确地指出了隐藏于这种景象背后一直起着关键作用的“国家因素”。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提醒人们应当格外留意其中包含的道德风险问题。Riedel等(2007)也曾注意到中国银行业“虽然资不抵债但不缺乏流动性”的情形,并对政府“隐性担保”、银行体系道德风险以及银行危机之间长期存在的“危险平衡”有着清晰认识。重要的是,他们进一步发现,高不良贷款与高盈利现象竟然在银行体系中长期并存!按理说,国家担保只能保证坏账累累的银行体系不至于“关门歇业”,可是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效率低下的银行体系却拥有异常强劲的盈利能力。受此问题的牵引,Riedel等(2007)揭示了“高利差”的制度含义。在经济改革中,银行体系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利差,而利差又出自政府对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人为规定。政府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为了确保银行体系在为经济改革提供可贵金融支持的同时不至于深陷财务困局。更明确地说,利差是国家对银行体系所作金融贡献的一种制度性补偿。

其实,有关中国改革中银行体系流动性以及盈利性与高呆账长期并存的机理,在Anderson(2005)稍早的研究文献中已有讨论。他认为,银行的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之间的比率,而不是其差额。事实表明,相较于其它经济体,中国的存贷款利率之差并非最大,但存贷款利率之比却属最高。无疑地,存贷款利率之比越高,银行体系就越有能力应对高不良贷款率。不过,Anderson(2005)更有价值的观点来自于对政府补充银行资本“方式”的讨论。改革以来,中国政府曾经数次给国有银行体系注资,按常理,所需资金数额之巨足以形成巨大财政压力。可是,实际操持此事的政府却显得“举重若轻”。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政府注资采取的是“金融方式”,而不是“财政方式”。也就是说,注资所需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中央银行,而不是财政部”。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注资对政府几乎是“无成本”的,因为它“不会增加政府目前的负债”。与此同时,由于市场对真实货币的需求持续增长,因此,实际借助基础货币扩张来维持的银行注资在短期也不会有引致通货膨胀之虞。无论如何,在全球银行发展史上,这的确堪称一种独一无二甚或空前绝后的银行注资“实验”。

需要提及,面对改革进程中的中国金融制度问题,兼具中国本土文化背景和西学素养的主流学者也时有议论且不乏有价值的见解。钱颖一和刘遵义(1994)就曾确认中国国有银行的呆账问题不同于其他许多国家,从表面看,中国的银行呆账问题要简单一些,因为呆账的债权人(国有银行)和债务人(国有企业)最终归属于同一个“人”即国家。因此,从理论上讲,债务清理可以便捷到“简单注销”即可。可是,实际情形则要复杂许多。由于当事人各方都拥有各自的“局部利益”,且这些利益在债务清理中都被要求得到考虑,结果,相关改革往往会因过多权衡而屡陷僵局。

### 四、国家举债的“金融方式”及其绩效

关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原因,前述一些文献已有不同程度的讨论。陈志武(2006)则另辟蹊径,强调了“举债模式”的重要性。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持续增长,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敢于“借钱花”。历史地看,17世纪以来,大凡“国库中存银万贯的国家今天大都贫穷落后”,而立足举债的国家则基本上臻于富足进步。这种情形显然有悖直觉和常理,个中机理何在呢?通常而言,各国政府都难免遭遇财政困境乃至危机,不过,缓解危机方

式的选择则事关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途。从理论上讲,缓解财政危机的方式无非有二:增税与举债。增税自然来得痛快,且无偿还之虞,但这种方式会使单位时间的税负迅速增加,从而对社会造成极其强烈的“即期冲击”。中国绝大多数王朝走向崩溃的主要原因大致可归咎于此。举债的奥妙则在于将原本集中于一时的税负与财政开支压力分摊到未来足够长的时间区间中,社会所承受的即期冲击也大为减轻。

很显然,举债模式超越了增税模式所设定的“即期收入决定即期支出”的代际门槛,而致力于追求财政资源的跨时配置。既然是“跨时”,则相应的金融制度条件也就必不可少。陈志武(2006)认为,举债的绩效取决于两个因素:国债利率和投资回报率;前者为举债成本,后者为举债收益。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当后者大于前者时,国家才会有举债筹资的激励。那么,如何保证举债的净收益呢?有效的金融市场自不待言,而良好的投资机会也不可或缺。前者通过提供更多的风险组合以及给予投资者更大的市场信心而保持利率的低水平,后者则以更多的项目选择增进投资的收益。对于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的确持续创造者更多高回报的投资机会,但金融市场的发展则差强人意。这就意味着,从严格意义上看,政府举债的金融市场条件(成本条件)并不完备。既然如此,堪称成功的中国举债模式一定有着别样的“格局”。不无遗憾的是,陈志武恰好对此有所忽视。

不用强调,陈志武只关注举债的“财政方式”,对于主流框架而言,这纯属正常。可是在中国,还存在着另一种更为重要的举债方式,那就是“金融方式”。相比之下,在经济改革中,国家通过金融方式实现的“举债”规模要远远大于财政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金融方式举债需要特定金融制度安排的支持,在中国改革过程中,这种制度安排就是国有银行体系。若换一个角度,对国家来说,前述 McKinnon 所定义的“金融剩余”其实具有金融“举债”的性质,而曾经积存于国有银行账面上的巨额“不良贷款”更是相当于政府代表国有经济发行的“长期债券”。不仅如此,国家为便利金融方式“举债”一直维持着相当宽绰的净收益(利差)区间。比如政府通过“隐性担保”极大地削减了存款债务的风险补偿,从而保持了较低的筹资利率(成本)水平,与此同时,又人为设置贷款利率下限,以确保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基于如此优越的制度条件,国有银行体系拥有了为国家举债的长期激励与能力。在国家面临财政下降困境而又一时难以通过财政方式大量举债的情况下,借助金融方式实现的巨额债务筹资就成为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

## 五、金融转型的历史文化涵义

作为综合运用“历史-制度”以及“理论-定量”方法<sup>①</sup>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最早尝试者之一,邹至庄(Chow)对中国货币金融现象的观察和梳理可谓细致客观而又严谨独特。比如,在那本倍受国内外经济理论界推崇的专门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著作(2002)中,他就曾透过居民存款与政府“隐性担保”之间的高度依赖关系,初步揭示了中国银行体系的超稳定机制,如他认为,“只要呆账不迅速增加,中国人民不断存款,商业银行将继续运行”。与此同时,基于他对银行高税负和员工高薪金现象的细致观察,长期掩藏于国有银行制度深处的高呆账与高盈利的“奇妙组合”也逐渐浮出水面。此外,他对国有银行改革的长期性与渐进性有着十分清醒而充分的估计,其基本依据是,整个改革过程难免受到银行外部“政治目标”以及内部“官僚行为”的掣肘。这就意味着,金融制度改革的每一步推进都是一系列“利益妥协”的结果,而做出妥协是需要时间的。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不同,Chow 并不一味反对政府的金融控制,他曾发问:“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控制金融机构”?尽管缺乏进一步的理论解答,但提问本身就足以表明其面对中国问题时的冷静与执中。

<sup>①</sup> Chow(2002)强调,研究中国问题之所以需要“综合运用历史-制度的以及理论-定量的方法”,那是“因为其中任何一种方法本身都不能提供一幅清晰完整的画面”。“如果对历史-制度背景缺乏扎实全面的了解,在将理论-定量模式应用于中国经济时,人们可能会犯严重的错误”(序言)。

无独有偶,陈志武对中国金融变革问题的研究带有更为浓厚的历史-制度主义色彩。他(2007)认为,改革以来中国金融制度演进的基本特征是,人们力图在不改变国有金融垄断的前提下找到一组既能妥善理顺委托-代理关系又能可靠执行金融合约的制度安排。为什么非要做如此艰难的制度探寻?或者说,除此就别无其他简单明了的选择了吗?对此,陈志武并未给出直截了当的答案。与其他多数主流学者一样,他表明了“国家拥有银行和证券市场会带来太多的道德风险与利益扭曲”以及“窒息金融创新、阻挡金融所需要的制度变革”这样一种程式化的理论态度。但有所不同的是,他并未像其他许多学者那样动辄借助一些“舶来”的定理和模型在仓促间作出你是我非的简单价值判断,而是小心翼翼地甄选合适的观察角度,力求平心静气地得到相关结论。显然,他体会到了问题的复杂与深邃。正因如此,陈志武开始关注和剖析“关系金融”(relationship finance)。根据他的理解,“关系金融”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制度结构牵扯颇深,或者说,这种金融制度的基本规则就“存在于模糊不清的道德习俗之中”。重要的是,在生产规模较小和交易半径较短的传统经济中,基于熟人信任的“关系金融”基本够用。可是,一旦经济增长和市场发展提出更进一步的金融需求,则既有的传统金融制度将难以胜任,这时,就需要一种超越于“人际关系”的崭新金融制度来接替。

问题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努力,虽然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市场发展举世瞩目,可那种具有“非人格化”(impersonal)内涵的崭新金融制度依然未能完全确立。或者说,在这种金融制度“缺席”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金融仍然取得了长足进步。这种情形不能不让人怀疑,上述金融制度的“接替”逻辑是否属于必然。不无遗憾的是,尽管已经着眼于历史-制度视角,但是由于片面坚守市场有效的单一标准,陈志武最终还是将问题简单化了。其实,在他眼中,“关系金融”与市场金融之间的制度“接替”包含着纯粹的新古典逻辑,它是在忽略诸多制度条件基础上设计出来的一条制度演进“坦途”。如果考虑到一些特定的制度条件,则“接替”传统金融的制度安排就不一定只是市场金融,而极有可能是另一种同样可以满足更大范围金融交易需求的“人格化”(personal)金融。在中国,这种金融形式就是政府主导型金融。可以说,政府主导型金融制度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强制性”制度选择,而是一国财富分布结构、社会合作能力、产权保护制度以及金融交易方式的“函数”。

## 六、结 语

经济改革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平均保持 10%左右的高增长率,这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创造东亚经济奇迹之后,东方文化圈创造的又一个经济增长奇迹。而且,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速之高、延续时间之长可谓史无前例,纵览迄今百余年世界经济增长史,尚没有哪个国家出乎其右。一时间,探寻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以及机理便成为全球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经过多年的学术努力,国内外经济学家已经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中国经济增长的部分机理也随之渐露端倪。

大致看来,最初国内外探究中国经济增长机理的绝大部分文献将重心集中在经济分权、基于劳动力价格优势的出口推动以及政府主导型投资机制等方面;对于金融因素的作用也曾给予相当程度的关注,但大多数文献倾向于强调经济改革过程居民储蓄存款的稳步增长为财政收入下降背景之下的中国投资过程及时提供了金融支持,一些文献留意了高速经济增长对银行体系信贷机制的刚性依赖以及由此导致的金融风险后果,而对金融制度方面的深层原因则有所忽视。

随着金融因素施之于经济增长过程的作用日益显著,国内不少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机理,一些文献已经触及金融制度的相关层面。随着国内相关文献的大量积累,中国经济增长的部分深层金融制度原因被渐次揭示出来(张杰,2010)。与此同时,长期关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也对金融制度层面的问题怀有浓厚兴趣,相关研究文献也在迅速积累。客观地说,国内经济金融理论界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及其相关结论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因而缺乏应

有的梳理与总结。其实,这些文献虽然难言系统甚至有时失之准确,但是,透过这些文献的观点与命题,可让我们对于正在经历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部分金融制度原因获得另外角度的观察与理解。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主流文献有关中国经济增长之金融制度原因的相关讨论为中国本土学者检讨其在该学术领域的研究水平提供了某种学术参照或者理论标尺。客观而言,在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原因的理论解读方面,中国本土经济学家占有明显优势,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国际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方向。经过经济改革以来长期的理论酝酿与学术锤炼,中国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只有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与视角深入观察与解读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真实“故事”,方有可能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任何简单移植主流“技术”而漠视中国本土真实问题的所谓提升中国经济学水平之道,都只会将中国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引入歧途。仅从这种意义上看,本文所初步梳理的主流经济学家探寻中国经济增长金融制度原因的学术努力就更值得我们珍视。

#### 参考文献:

- 陈志武(2006):《治国的金融之道》,《经济观察报》,10月23日。
- 陈志武(2007):《金融现代化为何如此艰难?》,李利明、曾人雄《1979-2006:中国金融大变革》,序言,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 钱颖一、刘遵义(1994):《关于中国的银行与企业财务重组的建议》,《改革》,第6期。
- 张杰(2006):《中国的高货币化之谜》,《经济研究》,第6期。
- 张杰(2010):《中国货币金融运行的制度含义:本土文献的诠释》,打印稿。
- 赵人伟(2008):《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回顾与思考》,《经济研究》,第12期。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1985):《宏观经济的管理与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言论选编》,经济日报出版社。
- Anderson, J. 著,余江译(2006):《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中信出版社。
- Bonin, J. and M. Schaffer (1995): *Banks, Firms, Bad Debts and Bankruptcy in Hungary, 1991-1994*.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er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Discussions Paper.
- Chow, G. (2002):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Blackwell Publishers.
- Friedman, M. and D. Rose 著,韩莉等译(2004):《两个幸运的人》,中信出版社。
- Gao, S. and M. Schaffer (1998): *Financial Discipline in the Enterprise Sector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How Does China Compare?* Center for Economic Reform and Transition Discussion Paper: 98/1, Heriott-Watt University, Edinburgh.
- Heffernan, S. (2005): *The Modern Banking*. John Wiley & Sons, Inc, 362-364.
- Maddison, A. (2007):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2030 AD*. Development Centre, OECD . Paris.
- McKinnon, R. (1993): *The Order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2d e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 Riedel, J., J. Jin and J. Gao(2007): *How China Grows: Investment, Finance, and Refor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Bank(1989):《中国:宏观经济稳定与工业增长》(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考察研究丛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World Bank(1996):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From Plan to Marke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周莉萍)